

跨文化交际学介绍

一、从问题谈起	3
二、研究文化冲突的一门新学科：跨文化交际学	11
三、无所不在的文化	34
四、一对孪生姐妹：语言和文化	49
五、不同语言也能交流	79
六、社交往来与人际关系	102
七、贯穿一切的红线：价值观念	126
八、如何培养跨文化意识	138
参考书目	162
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网址	173

跨文化交际研究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177
Why Bother about Culture in ELT?	183
The Revelation of a Cross-cultural Survey	195
Indirectness Revisited: On the Communication Style in Two Types of Chinese Letters	209
On the Changing Values of Mainland Chinese	224
Analyzing the Changing Character and Sophisti- cation of TV Advertisem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38
References	275

跨文化交际学 介绍

早上一进课堂，首先说声“早上好”。学生会说“Good morning, teacher”这是在课堂上经常发生且大家都熟悉的情景。但是：这样简单的问候语，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场合可以是“老师好！”或“老师早！”而在课堂“老师”不仅是指老师，对教授、讲师、助教，在英语中“teacher”习惯以其作为称呼，也不再带称。在英语国家，如：小的时候叫老师一声先生姓的冠词 Mr. Mr 或 Miss，譬如，一个叫 John Smith 的人在写信时，学生通常要称他 Mr. Smith，早上打招呼时说“Good morning, Mr. Smith”，也可能只说“Good morning。”在大体上如何称呼，取决于学术职称以及听过什么学位。对于教师，很简单，一般在姓前加上 professor，如 Professor Smith，由于不是教授，则教授、老师过加上学位的教师，称为 doctor，如 Dr. Brown。对于其他教师，则用 Mr. Mrs 或 Miss 等称呼。年轻的或是刚到国外的教师若希望被十以名（养老）相称，譬如 Paul Johnson 可以简单地叫他 Paul。对于某位老师具体地称他物理学，还称他个人特征，关照他家，师生之间绝无大小等。尽管 teacher 不计年龄，professor 却可能家有老人。例如：在讨论会上，可以说：“I have a question, Professor.”当然，一般情况下还是称 Professor Johnson, Professor Brown 等为妥，在英语中没有一个像中文里用出人对偶语的“老师”完全对应的对称词。

从问题谈起

无论在校园里或是在外事活动场合，只要我们稍一留心就会发现，有些学生或年轻的翻译尽管英语语音、语法学得不错，词汇也掌握了几千，说话却往往不很得体。这里不妨举些例子。

例1：上课铃响，教师进教室，学生起立，齐声说：“Good morning, teacher.”这是我们在校园中几乎每天都看到的情景。但是，这样说符合英语习惯吗？在汉语中可以说“老师好！”或“老师早！”，在这里“老师”不仅是称呼语，还是尊称。但是，在英语中teacher却绝不可以作为称呼语，也不是尊称。在英语国家，中、小学生称呼教师一般是在姓前冠以Mr, Mrs或Miss。譬如，一个叫John Smith的人在中学教书，学生通常要称他Mr Smith。早上见面时说“Good morning, Mr Smith”，也可能只说“Good morning！”在大学里如何称呼，取决于学术职称以及得过什么学位。对于教授、副教授，一般在姓前加上professor，如Professor Smith。对于不是教授、副教授，却得过博士学位的教师，称为doctor，如Dr Brown。对于其他教师，则用Mr, Mrs或Miss等称呼。年轻的或比较时髦的教师常常要学生以名（教名）相称。例如，Paul Johnson可能要学生叫他Paul。对于某位教师具体如何称呼，还要看本人脾性、关系远近、师生年龄差距大小等。尽管teacher不作称呼语，professor却可用来称呼人。例如，在讨论课上，可以说：“I have a question, Professor.”自然，一般情况下还是称Professor Johnson, Professor Brown等为妥。在英语中没有一个意义和用法上与汉语的“老师”完全相同的对应词。

例 2：一位在中国工作过多年的英国教师到学校礼堂去看英文电影，路上遇到学生也忙着去礼堂。学生根据汉语中打招呼的习惯很有礼貌地说：“Are you going to the film?”这位外籍教师觉得很奇怪，心想你明明看着我往礼堂走，知道我去看电影，为什么还要问这样的问题？事后的评论是：What a stupid question!

例 3：一位新西兰籍女教师在华工作一年，回国后对朋友说：“我在中国至少有一百次被问到我的年龄，而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自从我成年以来，记不得有谁问过我多大年岁。”

例 4：英国一位教学法专家初次来华讲学，临别前被邀出席一次晚宴。席间，我们的一位教师当着各方宾客的面，问他一年拿多少薪水。他感到十分尴尬，本想含糊其词，又恐失礼，最后只得如实说出。回来以后长叹一声说：“I had a most bizarre day. (这一天过得真太怪了。)”

例 5：有一位英国女教师，全名是 Marcia Dale。有些学生称呼她时叫她 Dale，使她很不愉快。后来在一份意见表中她写道：“在交往中，我发现最不能容忍的是学生坚持用我的姓称呼我。在英语口语中，从正式的到很随便的称呼，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如果只叫姓，那是绝对错误的。”

这里举出的是一些比较浅显的例子，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涉及的方面也远不止此。但是，以上几例已能大致说明一个问题：学习英语不能不同时注意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

长期以来，我们在教学上对这个方面重视不足。学生犯这类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学、教材重视语言形式而忽视语言形式的社会意义，忽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许多课文都包含这类的“对话”：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Li Hong.

How old are you?

I'm twenty.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Nanjing.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the library.

Are you writing a letter to your parents?

Yes, I am.

How often do you write to your parents?

About once a fortnight.

这类对话大致都是“中文的思想+英文的形式”。形式固然正确，但却忽略了讲话是否得体这一重要方面。除了在医院、移民局这类地方，很难想象会有人一连串地问：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 这类问题。英美人对于一再地被问 Where are you going? 在心理上的反应（一般情况下自然不会说出来）是：Why do you ask? 甚至于是：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至于问一个人在给谁写信，更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的私事。我们的教材对于这类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往往很少加以注意，学生又往往机械模仿，学了什么用什么，对语言学习中的浅滩暗礁心中全然无数。

重视语言形式而忽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忽视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是一个涉及跨文化交际的重大课题。教师碰到什么讲什么，固然对学生有帮助，但是，关键还是要先解决认识问题。认识统一了，具体措施是不难找到的。

在认识方面，有三个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好。一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一是语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 与交际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的关系，一是外语教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对语言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把语言看作是语音、

语法、词汇的总和，或者仅仅看作是一种符号系统；另一种看法是把语言看作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认为语言的使用离不开社会环境。修辞学始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从19世纪中叶以来又陆续在人类学领域展开对语言的研究，出现了人文语言学（ethnographic philology）、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等学科。人类学家 Malinowski 对英国语言学家 Firth 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上他对于整个社会语言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长期以来人类学着重于人种、文化和语言三方面的研究，因此，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始于人类学也就顺理成章了。

美国杰出的语言学家 Sapir 在他的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一书中写道：

“语言有一个环境。使用语言讲话的人们属于某个或多个种族，也就是说，属于一个由于身体特征不同而与其他集团分开的集团。再者，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这些做法和信念的总体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性质。”（Sapir 1921: 221）

在同一本书的另一个地方，Sapir 对于文化和语言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Sapir 1921）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言是某个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一面镜子。举个简单例子，在汉语中，我们有“祖母”与“外祖母”之分，而在英语中，一般情况下不予区分。如果一定要说清楚，可以说 paternal grandmother 和 maternal grandmother，或者加上 on the father's side, on the mother's side 这类说明。在这里，区分或不区分确实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赵元任（Y. R. Chao）先生（1976: 323-330）在《中国人的各种称谓》（Chinese Terms of Address）一文中列举了 114 种对于亲属的称谓，每种又有正式名称、直称及比较文气的称呼之分。例如，父亲方面的 great-grandfather，在汉语中的正式名称是“曾祖”，直称时用“老爷”。

爷”，书信中可能用“曾祖父”。又例如，父亲方面的granddaughter-in-law的正式称呼是“孙媳妇”，直称是“孙少奶奶”，书信中用“孙媳”。

汉语中亲属称谓如此繁多，反映了汉族大家庭的现实。了解这些语言现象无疑有助于了解汉族的家庭结构。随着家庭规模变小，家庭成员居住越来越分散，以及其他社会情况的变化，大家庭中的许多称谓也就使用得越来越少。“老爷爷”和“孙少奶奶”这类称呼对于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十分陌生的。有的人可能只了解“老爷爷”是托儿所孩子对老人的尊称，而不知道它是曾祖父的又一个说法。

Fries认为语言与文化在社会环境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曾以breakfast一词为例。词本身的意义是很清楚的：早上的第一顿饭。但是，他认为如果不了解breakfast包括哪些东西，在哪里吃，和谁一起吃，在什么时候吃，就仍然不能充分理解这个词的意义。（转引自Robinett 1978: 155）欧洲大陆早餐和英国早餐不同；美国人早餐和英国人早餐也不一样。不用说，中国人的早餐和英美人的早餐更是两样。如果不了解英美人吃饭的习惯，学生对于John's having his breakfast这句话的了解只能是一般的、概念性的，而不是十分具体。

House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英美人头脑中的反应和一个不了解西方居住情况的中国学生所想到的是极为不同的。没有来过中国，不了解中国风俗习惯的英美人很难想象什么是Spring Festival。中国绝大部分学生也不清楚究竟Christmas是个什么样子，这个节日对于英美儿童意味着什么。没有进过中国餐馆的英美人也不能理解spring rolls和chowmein。“饺子”固然可以译为ravioli，但是，“饺子”毕竟不是ravioli。不了解当今的英美社会，就不能准确地理解boyfriend, girlfriend, partner, solo parent, Sunday father等一般的词所包含的意义，当然更无法了解privacy, individualism, liberal等抽象词的含义。

总之，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了解英美文化，要学好英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越深刻细致地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至生活细节，就越能正确理解和准确地使用这一语言。

应该注意的文化差异范围很广。大的方面包括诸如社会阶层、家庭结构（家庭大小、家庭关系、结婚、离婚等）、职业（种类、特点、上下级关系等）、社交活动等；小的方面如约会、打电话、吃饭习惯、禁忌、打招呼、握手等等。当然，首先还是要注意大的方面的差异，再逐步深入到细枝末节。我们力图了解得深入具体，但是不可能要求把一切细节都弄清楚。

第二个方面是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社会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语言形式和社会制约（社会环境）的关系。交际能力大致包括了两个方面的能力：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社会语言学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譬如，学习 *Lovely weather, isn't it?* 这句话，不仅要注意其语音（音素、重音、语调、节奏等）、语法（反意疑问句的构成）和词汇（*lovely* 的用法）等方面，还要知道这句话在什么场合使用。假若在一个追悼会上遇到一位朋友，你劈头第一句就是：“*Lovely weather, isn't it?*” 大家一定会觉得你头脑有些不正常。我们的学生对话，连珠炮似地问对方：*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 Do you like Beijing?* 等等，就是只具备语言能力，而不具备社会语言学能力的生动说明。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在教学中把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学能力割裂开来的缘故。英语国家的孩子在学习英语时，两种能力是结合在一起学的。例如，母亲告诉孩子不要随便打断别人的谈话，要插话时先要说 *Excuse me*。孩子学会了说 *Excuse me*，也知道在什么场合下使用。有一次，我在一位澳大利亚朋友家里作客，大家坐下来准备吃饭的时候，男主人起身去接电话，客人在有礼貌地等待，这时主人的四岁小孩对母亲说：“*I'm hungry, Mum.*” 女主人马上轻声说了一句：“*Don't be rude.*” 孩子从这个场合学到了这样

一点：在客人面前这样说话是不礼貌的，也了解到主人、客人必须同时吃饭，不能因为自己饿了就先吃。在中国人的家庭里，孩子大体上也是这样学会交际能力的。

语言是交际的一个主要途径，但并非唯一的途径。人们对于语言以外的交际手段加强了研究，其中包括手势、动作、姿态、表情、触摸、讲话人之间的距离等。英国人和法国人、北美人和南美人、东方人和西方人之间在这些方面有许多差异。例如，人们注意到阿拉伯人讲话时互相之间可以保持的身体距离比英美人大。

影响交际的因素很多，Dell Hymes (1974) 将其归纳成为一个首字母缩略词 SPEAKING。S 代表 Setting and Scene (背景和场合)；P 代表 Participants (参加者)；E 代表 Ends (目的及结果)；A 代表 Act Sequence (信息的形式与内容)；K 代表 Key (传递信息的方式)；I 代表 Instrumentalities (使用什么语言、方言等)；N 代表 Norms (各种情况下应遵守的规范)；G 代表 Genres (体裁)。

由此可见，在交际中要照顾的方面确实很多，讲话规则 (rules of speaking) 虽已总结归纳了一些，但还不足以作为各种场合讲话的具体指导。这就给学习外语的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长期以来，语言学着重研究的是语言本身，研究语言的语音系统、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历史发展等，研究的对象是索绪尔所说的 *langue*，而不是 *parole*，着眼于语言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各种现象。在美国，无论是上个世纪 30 到 60 年代风靡一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结构的研究，还是以后乔姆斯基对所谓“理想的听话人—讲话人” (the ideal hearer-speaker) 的语言能力的研究，大致都撇开了语言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约。这种情况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期以来发生了变化，重心逐渐从结构转向功能，从孤立的语言形式转向在社会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Hymes 1974: 77)

第三个需要弄清楚的关系是外语教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外语教学并不简单地教些语音、语法、词汇，而是涉及多学科的

一门学问。美国教学法家 James Alatis (1978: 6-8) 把这些学科归纳为首字母缩略词 LAPSE: L 代表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 代表 Anthropology; P 代表 Psycholinguistics and Psychology; S 代表 Sociolinguistics and Sociology; E 代表 Education and English。外语教学和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密切相关自不待言，那么它和人类学、社会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前面已经谈到，人类学家远在社会语言学出现之前就已经在致力研究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社会语言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经常需要利用人类学家已经取得的成果。人类学从着重研究历史沿革到着重研究和描述人类社会的现状，再发展到研究人类行为的内在规律，这与语言学的发展有类似之处。人类学家近年来所提出的关于语言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的看法，与社会语言学家关于交际能力的提法有许多相通之处。

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面是社会本身，诸如社会机构（从家庭到国家）、各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等。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与语言的使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语言学有很高的价值。

除了 Alatis 所讲的这些学科，作为外语教师和外语学习者，我们还需要了解跨文化交际学。这是一门新学科，它的历史与社会语言学的历史一样长。要从事有效的顺利的交际，要将外语教学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外语学习者和外语教师不可不学跨文化交际学这门学问。

研究文化冲突的一门新学科：

跨文化交际学

【什么是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对于一些读者来说是一个新词，实际上，我们经常在从事跨文化交际，只是我们不自觉而已。我国外交部长与外国领导人谈判是在进行跨文化交际，进出口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外国商人谈生意也是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我们和外国旅游者、外国留学生、外国教师交往同样是在进行跨文化交际。即使我们不与外国人直接接触，仍然可能在从事跨文化交际。例如，阅读外国小说，观看外国电影、电视节目的过程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我们作为读者和观众与小说的作者、电影电视的导演和演员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理解外国小说、电影电视是一个复杂的跨文化交际的过程。

简言之，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际。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相互接触和融合，这其中充满了丰富的跨文化交际的内容。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丝绸之路使我国古代人民通过商业往来与中亚、西亚、非洲、欧洲的人民进行交流，这是我国早期在国际范围内的跨文化交际的一个突出例证。印度佛教的传入，唐朝鉴真高僧的东渡，明朝郑和下西洋，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以及历经数百年的西学东渐包括了十分复杂的跨文化交际的过程。由此可见，跨文化交际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在我国如此，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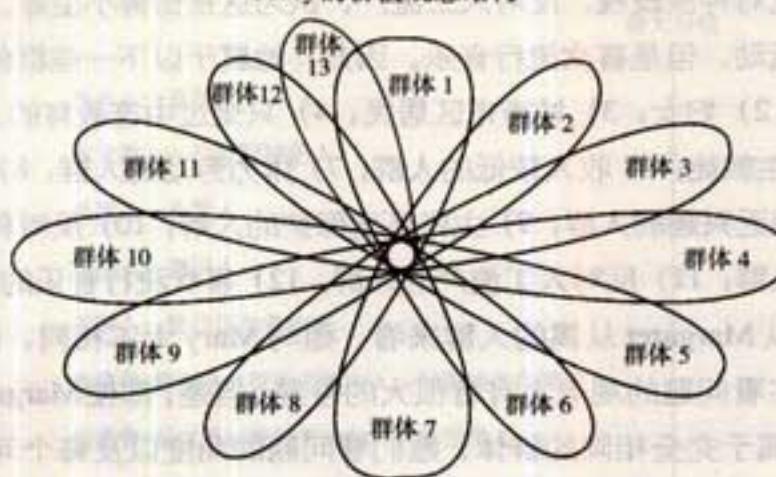
跨文化交际之所以在今天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主要是由于交通工具的进步与通讯手段的发展使得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能够频繁地接触和交往。上个世纪初需要几个月才能从我国的上海到达美国的洛杉矶，而今天却只需要十几个小时。电话的普及使得一般信函的数量不断减少。卫星转播电视节目使得全世界的人们可以同时观看世界杯足球赛。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更把全世界的人们通过计算机网络联系起来。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人们交往的频繁都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的。这一切使得跨文化交际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L. S. Harms (1973: 2) 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的交际经历了五个阶段：语言的产生—文字的使用—印刷技术的发明—近百年交通工具的进步和通讯手段的迅速发展—跨文化交际。Harms认为，近二十年来的交际是以跨文化为特征的。这是人类交际的第五个阶段。在他看来，跨文化交际包括国与国之间的交际，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之间的交际。例如，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之间的交际即属于国与国之间的交际。美国白人与黑人的交际属于不同种族之间的交际，而我国汉族人与壮族人的交际则属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际。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因此，我国南方人与北方人的交际也是跨文化交际的一个方面。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与语言的产生可以相提并论。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任何两个人之间的交际都是跨文化交际，因为，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每个人在文化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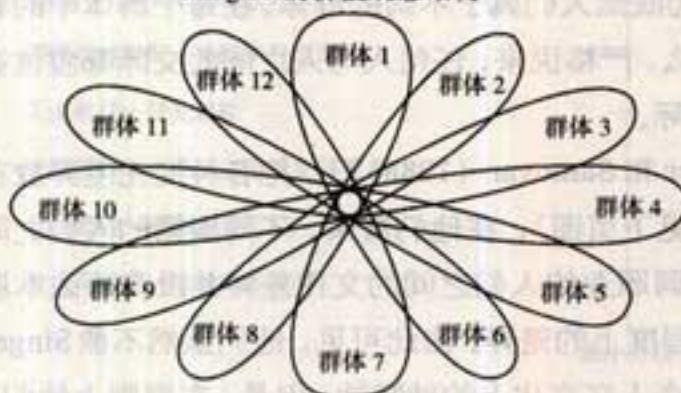
Marshall Singer 持有的就是这样的观点。他认为，首先，每个人都隶属于若干群体，而且，没有两个人隶属的群体是完全相同的。其次，即使在同一群体中，每个人的态度、价值和信念也不会完全一样。因此，在文化上每个人都应该被认为是独特的。(1987: 2) 请看下面的两幅图。

图的意思是 Mary 和 Margaret 分属于许多不同的群体，因此他们的价值观念结构也十分不同。Mary 是一位白人已婚中年妇女，住在芝加哥郊区，信奉基督教，受过大学教育，在一家计算

Mary的价值观念结构



Margaret的价值观念结构



机软件公司工作。她倾向于民主党，在选举中投克林顿的票。她主张环境保护，反对种族歧视。业余时间她喜欢打网球，参加了一个网球俱乐部。假期中她常常与朋友一起去爬山。我们可以说，Mary 属于以下的群体：1) 白人；2) 已婚的人群；3) 中年人；4) 妇女；5) 城市郊区的居民；6) 基督教徒；7)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8) 有职业的人群（以别于失业人群）；9) 中产阶级；10) 支持民主党的人群；11) 主张环境保护的人群；12) 反对种族歧视的人群；13) 喜欢运动的人群。

如果我们有兴趣，还可以作进一步更细致的分析。

Margaret 是位黑人妇女，居住在华盛顿市区，中学毕业以后做过各种工作，收入较低，信奉天主教，目前在一家餐馆打工。她对于政治没有兴趣，从来都没有参加过选举。她主张环境保

护，反对种族歧视，反对人工流产，认为这是伤害小生命。她不喜欢运动，但是喜欢流行音乐。因此，她属于以下一些群体：1) 黑人；2) 妇女；3) 城市市区居民；4) 只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5) 天主教徒；6) 收入较低的人群；7) 体力劳动的人群；8) 对于政治缺乏兴趣的人群；9) 主张环境保护的人群；10) 反对种族歧视的人群；11) 反对人工流产的人群；12) 喜欢流行音乐的人群。

从 Margaret 从属的人群来看，她与 Mary 大不相同，因此，她们在看问题的观点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即使 Margaret 与 Mary 属于完全相同的群体，她们看问题的角度以及每个问题在她们心目中所占的分量也不可能完全一样。这就是 Singer 的出发点。他认为既然人们属于不同的群体，在每个群体中的看法又有差异，那么，严格说来，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交际都应该被视为是跨文化交际。

Porter 和 Samovar (1988: 23) 把各种文化差异放在同一个标尺上（见下页图），在他们看来，不同国籍的人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与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异。由此可见，他们虽然不像 Singer 那样过分强调每个人在文化上的独特性，但是，在原则上他们与 Singer 的观点是一致的。

Ron Scollon 和 Suzanne Scollon 在对于跨文化交际的看法上与 Singer 有共同之处。他们也认为人们属于不同的群体，而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群体都有各自的独特的语篇系统，因此，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语篇系统方面。研究文化差异不如研究语篇差异更有意义。下面这一段话可以概括他们的基本观点：“在跨文化交际讨论中，如果我们把焦点集中于作为亚文化系统的语篇系统，会更加有效。在这些亚文化系统中各系统之间的对比会更加突出一些。”(1995: 163)

Singer 和 Scollon 夫妇的观点反映了一些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一些现象的不满。他们认为作大范围的国与国之间的对比对于改进跨文化交际益处不大，应该把眼光放在更具体的文

最大分歧

- 西方人—亚洲人
- 意大利人—沙特阿拉伯人
- 美国人—希腊人
- 美国人—德国人
- 美国人—操法语加拿大人
- 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美国白人—居留地的印第安人
- 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美国白人—美国黑人
- 美国人—英国人
- 美国人—操英语加拿大人
- 美国城市居民—美国乡村居民
- 天主教徒—浸礼教徒
- 主张男性权力者—主张男女平等者
- 异性恋者—同性恋者
- 环境保护者—房地产开发商

最小分歧

化差异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范围应该也包括地区、职业、年龄、性别等方面的文化差异的探讨。这对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深入无疑是很有帮助的，也提醒我们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应该避免大而无当的比较。但是，实际情形究竟是怎样呢？我们稍作调查，就会发现尽管国与国之间的文化比较往往有许多弊病，人们仍然在花很大的（甚至主要的）力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书目中有大量的书籍是从国与国之间的对比研究出发的，例如：

Understanding Arabs: A Guide for Westerners

Border Crossings: American Interactions with Israelis

A Fair Go for All: Australian and American Interactions

From Da to Yes: Understanding the East Europeans

A Common Core: Thais and Americans

With Respect to the Japanese: A Guide for America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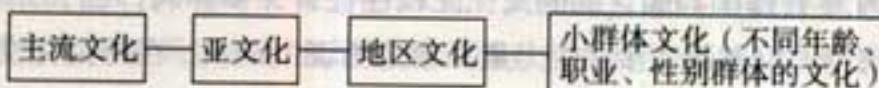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Germans, French and Americans

Management in Two Cultures: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U.S. and Mexican Managers

Cross-talk and Culture in Sino-American Communication

即使我们没有读过这些书，不了解它们的具体内容，仅从书名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采取的路数大致上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比。至于在文章的论述中作这类对比的就更是司空见惯了。

在作文化比较时似乎可以大到东西方对比，小到两个人之间的对比。中间还有种族、民族、国家、地区、阶级、阶层、职业、性别、年龄等等层次。我们研究跨文化交际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呢？这牵涉到文化的定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文化通常不是指个人的行为，而是指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笔者以为作跨国、跨种族、跨民族研究不仅应该是跨文化交际研究包括的内容，而且应该是放在首位的。至于地区、阶级、阶层、职业、性别、年龄等不同层次的差异也应该给予关注。至于个人之间的差异的研究只是在我们把他们当做群体的代表时才有意义。在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特点时，我们的眼光首先应集中在它的主流文化上，其次才注意它的亚文化和地区文化特点。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我们是否可以采取这样的顺序：



【跨文化交际学的兴起与发展】

跨文化交际学是研究人们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冲突的一门学问。跨文化交际学在英语中是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早期也称作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有的学者区分这两个术语，他们认为前

者强调过程，后者强调文化比较，但是大部分学者不作这种区分。目前使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术语的占绝大多数。

跨文化交际学首先在美国兴起是合乎逻辑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除了印第安人以外，其他人都先后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有来自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各国的移民。他们具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在相互交际中难免产生问题，因此，跨文化交际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争取自己权利与地位的斗争风起云涌，民族意识日益增强，各少数民族都强调维护自己的文化，于是逐渐地在美国社会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格局。在政府部门、企业、学校、民众团体中如何处理不同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其次，美国与各国交往频繁，每年大批政府官员、商人、技术人员、学者奔赴世界各地，与当地人有着各种不同的接触，而美国每年又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数以十万计的留学生、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和数以千万计的旅游者。对于大批留学生和移民的训练也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许多学者把Edward Hall在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看作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Hall是人类学家，对于文化与交际之间的关系一直予以关注。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Hall对于时间、空间与交际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使用时间、空间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书中Hall对于如何更科学、更细致地研究文化提出了一些设想。此后，他又出版了数部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著作。Hall在跨文化交际学的领域内对于其他学者的影响巨大。

在Hall的《无声的语言》一书出版以后，上世纪60年代陆续又有一些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著作问世。例如，1962年R.T.Oliver所著《文化与交际》(*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1996年A.Smith主编的《交际与文化》(*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1967年I.Parry发表的《人类交际心理》(*The Psychology of Human Communication*)等。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

就跨文化交际学在学术领域的地位而言,1970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国际传播学会承认跨文化交际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在学会下面成立了跨文化交际学分会。言语传播学会确定1970年年会的主题为跨文化交际与跨国交际。此后,许多大学的传播学系、教育系相继开设跨文化交际学方面的课程。

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交际学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出席人数超过2000人,出席人中有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传播学家、社会学家,也有商界、政界人物。1974年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学会(SIETAR, Society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Research)在美国马里兰州召开首届会议,正式宣布成立。这是跨文化交际学方面最有影响的一个组织。目前这个学会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组织,在欧洲设立了分会。它的名称亦相应改为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学会(SIETAR-International,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Research)。

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跨文化交际学的书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David Hoopes主编的一套选读本,Larry Samovar与Richard Porter合编的《跨文化交际学选读》(*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以及John Condon与Fathi Yousef合著的《跨文化交际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到70年代中期,在美国已经有两百多所大学开设跨文化交际学的课程。有的大学甚至授予跨文化交际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大学中,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不限于传播学系,在心理学系、教育系、语言学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都有这方面的课程。

这里有一份材料报告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大学中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开设情况。迈阿密大学的两位学者在1983年调查了138所大学的传播系的开课、教材、教师、作业、考试等方面的情况,写出了调查报告。他们的结论是:

“最重要的发现是过去几年中这门课程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Barna和Jain曾经估计,1978年有200所大学在开设这门课

程。假如我们的样本具有代表性，美国大学中的17.8%至少开设一门跨文化交际学课程，那么，目前大约有275所大学在开设此课。这就是说，在过去的6年中，这门课程增长了37.5%。被调查的大学还说明，在过去几年中，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人数增加了。这一势头还将继续，因为18.1%的学校表示他们不久将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Beebe & Biggers 1984)

不同的大学在不同的年级开设这门课程，但在三年级开设的最多，占57.6%，大部分学生是选修，占80%。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来自不同专业，包括传播学、言语交际、新闻学、教育学、工商管理、社会福利、医护等。教学方法按使用多寡排序，最多的是讲课，其次是小组讨论，以下是个案研究、客座演讲、电影、小组报告、角色扮演、实地调查、录像等。

教学内容按重要程度排列如下：

- 1) 文化差异及其对于交际的影响
- 2) 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
- 3) 跨文化接触及场合
- 4) 语言及文化，双语教育及翻译问题
- 5) 特殊的文化模式及其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 6) 非语言交际
- 7) 内圈和外圈的形成以及民族中心主义
- 8) 文化休克和文化适应
- 9) 民族、种族和亚文化
- 10) 主观文化理论
- 11) 对不同种族、民族和国家的成见
- 12) 融合理论

在有些学校的研究生中也开设了跨文化交际学课程。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已达到60多所大学。研究生课程的要求包括：

- 1) 使学生掌握一套统一的术语与定义
- 2) 要求学生深入考察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的某些特殊问题
- 3) 使学生能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作广泛接触
- 4) 使学生了解目前使用的克服文化障碍的方法

5) 给予学生机会,使其能够就他所感兴趣的文化作调查、分析和报告 (Smith 1984)

关于跨文化交际学究竟应该包括什么内容,我们可以从有些学者的论述中得到启发。Richard Porter (1972) 曾列出八个方面,即态度(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民族中心主义、偏见、成见等)、社会组织、思维模式、角色规定、语言、空间的组织与利用、时间观念、非语言表达。几年后,Porter 和 Samovar (1988) 在另一篇文章中归纳为三个方面,即观点(包括价值观、世界观和社会组织)、语言过程(包括语言及思维模式)和非语言过程(包括非语言行为、时间观念和对于空间的使用)。其基本内容并未改变,但略去了角色规定这一条。这说明他们深深受了Marshall Singer的所谓文化无非是观察问题的角度的影响。心理学家Michael Argyle (1988) 认为跨文化交际中主要的问题或困难有6个方面:1) 语言,包括礼貌用语;2) 非语言交际;3) 社会行为准则,包括赠送礼物等;4) 家庭和同事的关系;5) 做事的动力和动机;6) 思想观念,包括受政治影响产生的观念。Argyle在这里提到了Porter和Samovar所没有提到的社会行为准则以及宗教观念。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对于跨文化交际学的内容,学者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培训和咨询也逐渐发展起来。例如,美国政府对于和平队员在派出前进行有计划的细致的训练,提高他们的文化敏感和文化适应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效地工作。美国新闻总署对于富布赖特学者、教授也进行短期的培训。另外,民间的商业性咨询活动在近二十年以来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跨文化交际学在英国和前苏联】

跨文化交际学在欧洲发展得比较晚,而且具有不同的传统。总的说来,跨文化交际学与语言学的联系更密切。跨文化交际学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比较近的事情。